城市数据大脑推动管理城市升级

■ 莫开伟 财经评论员

杭州市政府在10月13日召开的云栖大会上公布了一项“疯狂”计划：为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杭州市安装一个人工智能中枢——杭州城市数据大脑。(10月13日财经网)

城市数据大脑即借助海量数据和阿里云ET人工智能技术,对整个城市进行全局实时分析,自动调配公共资源,修正城市运行中的Bug。它由超大规模计算平台、数据采集系统、数据交换中心、开放算法平台、数据应用平台等五大系统平台组成。其目标是让数据帮助城市做思考和决策，将杭州打造成一座能够自我调节、与人类良性互动的城市。

目前杭州市安装城市数据大脑条件具备，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等13家公司攻克了技术难关，尤其阿里云ET的人工智能内核运用于城市大脑计算平台飞天操作系统,有效保证了城市数据大脑能“眼疾手快”和“当机立断”。显然,这是城市管理的一次新尝试,且有杭州市萧山区部分路段投入试运营的成功经验,相信杭州市城市数据大脑一定能闯出一片管理城市新天地。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城市数据大脑使用应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现代、高效文明管理城市必备的硬件,拥有它可促进城市管理、城市功能、城市和谐和城市美化等全面升级。

它颠覆了传统城市管理方式，使城市管理手段提升、触角延伸、辐射面扩大,能有效覆盖原有城市管理过程中的许多盲区,极大地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促进城市管理升级。今天,国内城市多使用国外引进的SCATS信号灯控制系统，既不适合中国的“混合型”交通现状。尤其是城市建设导致线圈采集设备大面积损坏,SCATS系统相当于“眼睛”被蒙蔽了,控制信号灯的效果比理论预期差很多，且无法实现基于全局的决策判断。而城市数据大脑引入了地图数据、摄像头数据等,相当于城市大脑具备了“天眼”,能够从城市上空俯瞰全局。同时，采用了阿里云自主研发的网络流控制理论,可实现对网络阻塞点的全面量化。尤其,城市数据大脑已促进了城市管理蝶变,由智慧型管理向高智商、能决策的智能中枢转变,大大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

它丰富了传统城市管理内容，使城市管理无处不在,充分发挥“神经中枢”应有的管理功能,对确保城市交通、生活秩序正常运转带来了空前方便，极大了体现了人生化管理方式,促进城市功能升级。城市数据大脑借助海量数据和阿里云ET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将交通、能源、供水等基础设施全部数据化，并把散落在城市各个单元的数据资源连通,打通“神经网络”;借助人工智能中枢,使城市能够自我调节、与人类更好地互动:未来在交通领域,不仅可以治堵，还可为城市的各类事件提供交通方案。比如,TFBOYS要来开演唱会,城市大脑可以基于粉丝特点,结合城市道路信息,给出交通方案。同时在旅游方面还可为每个进入城市的游客提供个性化服务。其他方面诸如提供对水库、河道、泵闸等进行大数据采集、分析,结合天气数据,提前预测汛情和城市内涝。

它缓解了社会飞速发展带给城市的越来越多的压力，能有效化解城市在交通拥堵、人工管理等方面不足的矛盾,极大地节约管理成本,成为建立集约化、高效化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推动力，促进城市和谐化升级。

在交通领域，城市数据大脑是全球唯一能够对全城视频进行实时分析的人工智能系统。阿里云ET的视频识别算法,使城市大脑能够感知复杂道路下车辆的运行轨迹,准确率达99%以上。且这些视频如果由交警三班倒地去看,需增加若干倍警力,而通过算法，城市大脑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些视频都看完，数清楚有多少辆车往哪个方向走了。同时,通过智能调节红绿灯,能有效提高路段车辆通行速度。2016年9月,城市大脑交通模块正式在杭州市萧山区部分路段投入试运营，车辆通行速度提升了3%至11%,这符合建立节约型、绿色环保型社会的需要。

它释放了城市张力，使城市在未来发展中更加智能化、快捷化、多元化,更能使城市承载力、感召力、辐射力得到空前开发，使人类情感需求与城市管理规章实现更完美结合,促进城市美化升级。城市数据大脑可在一个虚拟的数字城市中构建算法模型,通过机器学习不断迭代优化,计算出更“聪明”的方案:每个路口红绿灯设置时间长度利于保证通行效率最高，科学设立路口转向标志最利于保证车辆快速通行,确定最利于公交车辆和线路调度的时间,制定最合理的城市道路修建方案和选址等等，这样使现代化城市显得更文明、更温馨、更能满足城市居民生活最方便化需求,自然增进了城市居民对城市的感情，调动市民热爱城市争当文明市民，提升城市品位,推动城市各项管理工作有序运转。

在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导致城市病正四处蔓延的今天，通过城市数据大脑统一指挥,更能趋利避害,推动城市各种资源最佳利用、各种功能最大发挥。

提高劳务税起征点很有必要

■ 黄春景 职员

实习旺季的尾声，批量结束实习返校的学生陆续遭遇“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个留下深刻印象的税制。该税制规定的800元的起征点,远低于工薪个税3500元的起征点。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实习生抱怨:“本来实习生就是廉价劳动力,2000元左右的报酬还要交20%的税。”(10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劳务报酬税到现在已经36个年头了,800元起征点挤压了千万低收入群体，无形中给他们施加了压力,尤其是在CPI居高不下的现实语境下，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没能真正体现。以800元为起征点的劳务税,这个起征点符合当时的国民收入水平,然而对于现在而言,国人的收入提高超过十倍,此举不仅不合理,也背离了所得税调节的本意。窃以为,要想让低收入群众感到公平，提高劳务税起征点是个立刻奏效的办法，这点跟提高个税起征点可谓异曲同工。

税收重要目的之一是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劳务税的起征点过低,导致低收入群体需要承担的税负过高,有违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年，不少人士都在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劳务税起征点过低问题，有关部门虽然也对此有过一些呼应,但令人遗憾的是,此事却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要看到,这些灵活就业人员没有工资、薪金,要在仅靠小时工赚钱的基础上交纳较高的个税,无疑令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雪上加霜。

近年来，劳务税让不少低收入群体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价值、缺乏尊重和尊严,其800元起征点可谓饱受诟病，已到了给低收入阶层减负的关键时候了。我们看到,这些低收入者的从业人员大都是在校实习生、小时工等非全日制的灵活就业人员,既然鼓励灵活就业,不能只有政策支持,税收也得跟上。特别是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进入“深水区”,劳务税改革理当与时俱进。

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劳务所得还是工资薪金所得,其购买力都是一样的,纳税能力应该相同,税收待遇也应该一样。加快劳务税改革步伐，调整其不合理之处，已显得迫在眉睫。虽然每个行业的收入不同,每个人面临的家庭情况和生活压力也不相同。但是,享受税负的公平待遇的宗旨是不变的。一言以蔽之,个税起征点不仅不该忽略低收入群体，还应设法为他们“保驾护航”才是。

在工资薪金个税起征点已提高至每月3500元的今天,以800元为起征点的劳务税不能总在原地踏步了,必须加以正视并解决。在我看来,劳务税的起征点至少与个人工资、薪金个税起征点持平,做到这点真有那么难吗?面对这一大批低收入劳动者，如果起征点从800上调至3500元或更高,在减轻了税负的同时,能让更多低收入者享受改革成果,这样的目标愿景,我们期待着早日兑现。

产品抽检应进行“不合格分类”

■ 何勇海 职员

日前,工商总局对淘宝、天猫、京东、1号店、唯品会等电商的电风扇、电磁炉、手机、插头插座、儿童用品、内衣、卫生巾等503批次商品抽检。经检测,总体不合格商品检出率为34.6%。其中,天猫商城出售的不合格产品数最多，居第一位。对此,天猫、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发出声明，将对线上平台产品质量进行更严格把控，清除山寨品牌，加强产品抽检。(10月11日《新闻晨报》)

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网络商品质量专项抽检,旨在促进网络商品质量提升,打击网络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净化电商消费环境,其良苦用心,显然值得肯定。不过,无论抽检结果怎么样,读者对于媒体带有渲染性质的“总体不合格商品检出率为34.6%”“××商城出售的不合格产品数最多,居第一位”等报道,却不太在意,甚至有一种耸人听闻的感觉。这样解读抽检结果,恐怕会对消费者形成一种严重误导，给电商平台与网络消费市场带来较大伤害。

抽检是从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取少量产品进行检验，据以判断该批产品是否合格的统计方法。从少量产品中再检出更少量的问题产品,能说“总体不合格商品检出率为多少多少”么?抽检不同于全检,抽检结果拿“总体”来说事,很难说公正科学。这些年我们总是在讨论“怎样的质量抽检才有说服力”,就说明抽检是存在问题的。至于“××商城出售的不合格产品数最多”,电商平台商品多得几乎数不清,抽取数十件商品检测,得到的结果未必能代表真实情况，媒体贸然给电商平台扣上“不合格产品数最多”的帽子,也未必客观公正。

不过如果深究,我们会发现,媒体对抽检结果进行带有夸大嫌疑的报道,或者误解性报道，极有可能是相关部门在公布抽检结果时,数据比较笼统模糊、标准不够明确详实、没有进行及时的抽检说明造成的。比如此番抽检涉及的电商平台众多，而不合格产品存在的问题也五花八门,有的是内在质量不合格,有的则仅仅是标签不合格、使用说明不合格,二者对消费者造成的危害可谓是天壤之别,对于问题不同的不合格产品,岂能笼而统之地统计在一起，并简单地做纯数据比较?

网络商品要打假，抽检制度也需改良。电商平台商品类别繁多,数量庞大,全检显然难做到,以固定的间隔,每隔若干个体抽取一个样本，进行系统抽样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换言之,提升抽检频率和范围，在多次、大范围抽检基础上，再进行大数据分析。对于不合格产品,不同的样本与问题不具备可比性,也需根据不合格程度进行“不合格分类”,而不是笼统地公布，让公众对不合格产品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比如插座插头不安全,与衣服标签不规定,压根儿不是同一安全级别,能笼统地公布吗?

必须强调的是，抽检网络商品的终极意义,在于落实责任主体,形成消费警示并给予网络经营者以严厉处罚，而不是给任何电商平台以及网络消费市场造成伤害，也不是让网购消费者不敢安心“剁手”。

国企扬帆远航须内外合力

■ 杜才云 职员

10日至11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10月11日)

国企,就是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国企经营的是国有资产，是国家最为重要的经济命脉,“国之司命”,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自明。

曾几何时,国企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有的国企负责人自定高得炫目的高薪,有的在招人进入、选任用人时徇私舞弊,有的国企在生产经营中乱决策、乱投资导致巨额亏损,有的国企领导损公肥私,等等,都实证了如果不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国企犹如商海中一条游弋的小船，会面临许多风险。

其实,一直以来,国企都有党组织,党组织也在开展工作，但由于国企经营国资的特殊性，当对国企的领导主要精力放在生产经营方面，而放松了对国企从严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导致企业党建存在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的苗头,也影响到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有鉴于此，党中央于近日召开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有其鲜明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会上,习总书记发表了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开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新局面的重要讲话,对国企提出了“五个力量”的重大要求,对国企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切实可行总体要求,是国企脱胎换骨、扬帆远航的重要指导思想，对国企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大海航行靠舵手”。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国企要做强做优做大，绝对离不开党的领导这个指明方向的“舵手”。国企只有紧紧依靠“舵手”的“北斗效应”,落实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抓好政治引领,健全国企干部队伍,推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严格把关国有企业领导选任，切实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国企内部加强党建的同时,还必须在外部发力,起到领导、指导和监督作用,党委组织部门也要履行好牵头抓总的责任、国资监管部门也要落实管资本管党建责任，只有内外发力、同心同向、铆足干劲,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才有充分的、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不竭动力。

滋补品“溯源体系”不妨推而广之

■ 邓海建 媒体人

10月9日，阿里健康联合天猫医药共同启动“滋补中国”品牌战略,并宣布建立“滋补中国追溯体系”,实现对滋补品“一品一码”的追溯。该品牌计划旨在与各地政府、品牌企业、行业协会合作,聚合有道地品质优势和品牌影响力的企业，让消费者能够购买到源自产区的道地滋补品。(10月10日中国经济网)

秋冬进补,养生常态。只是,保健市场套路深深，生产与流通环节又盘根错节,“道地药材”变成“道地骗子”的故事,也不算新鲜。今年2月4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在其官网上发布了《关于冬虫夏草类产品的消费提示》。“砷超标”事件,足以成为中国保健滋补食品乱象之示例。这是一个看似难解的困局：保健滋补品在品质上涸泽而渔,市场疑云密布,农户深受其害;宏调部门又不能插手微观市场，眼巴巴看着云谲波诡轮番上演,却始终难以重塑公信力量。

于此而言,阿里健康推进的品牌战略,似乎妥帖地解决了身份和作为的双面难题:不需要人人都自学成火眼金睛的专家,帮消费者把关审核滋补品质量。这当然不是最关键的,除了优选推荐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隐喻着中国保健滋补市场、乃至食药流通领域公信重构的“高铁之路”正在被搭建起来。说得更直白一些,在商家发财的逐利心思之外，公众更看重的是裨益公益的“溯源体系”。

食药监管,人命关天。监管之难,抽丝剥茧。一盒子滋补品或者一瓶子药品,它们的奇妙之旅如何展开？从原料辅料产地到生产过程,再到出厂流通等等,这些与之关联的关键信息，若能在客观公信的第三方追溯平台上、用手机APP就能检索核查,食药领域的乱象,怕是会少好几分。这就像电信运营商利用数据整合的欺诈号码查询平台一样,禁绝电信网络诈骗,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滋补中国追溯体系”,实现了对滋补品“一品一码”的追溯。理论上说,它有助于顺藤摸瓜地兑现生产经营者应当承担的食品药品质量责任。一方面,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弭信息不对称之下的“消费盲区”，真正得以监督食药产品的全领域、全流程;另一方面,有助于权力监管者发挥大数据优势，使得该领域生产经营的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尤其是在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时，能够及时召回相关产品、查寻原因。须记住的是,此前的“问题疫苗案”,已经为缺位的“溯源体系”敲响了警钟。

眼下,依托阿里健康,“滋补中国”品牌战略吃了“溯源体系”这第一只螃蟹。而巧合的是,就在上月底,媒体从国家食药监总局获悉:为控制食品药品安全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食药监局发布推动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完善追溯体系的意见。可见,“溯源体系”作为食药安全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迟早会落下最后一只靴子来。不过,借鉴滋补品“溯源体系”,打造第三方溯源平台,不仅是个出钱出力的活儿,更考验着公共治理的智慧。事实上,如何让消费者深度参与溯源过程,长远而言,这更是提振内需信心的大命题。

查处违法药企就该从“严”

■ 廖海金 财经评论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通告,严厉查处广西平安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26家药品批发企业违法经营行为。根据飞行检查结果,广西平安堂药业、山西瑞杰康药业、哈尔滨众鑫医药等16家药品批发企业存在为他人违法经营药品提供条件、购销记录不真实、货账票款不一致等违法经营行为,待相关情况查实后,将依法严肃处理,直至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10月10日《北京日报》)

这次受到查处的26家药品批发企业,是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根据《关于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经营行为的公告》,在飞行检查中发现的。然而,从通报的情况看,药企的违法违规面竟然百分之百地“全覆盖”,也就是说,检查26家,家家都有问题,且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这就令人唏嘘不已了。

应当承认,近些年来,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修订与完善,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对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药品安全

形势总体趋好。但事实上,这几年药品问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从近期公安部门破获的一系列药品制假售假案、从今年上半年“山东问题疫苗案”再到前不久的浙江台州“毒胶囊事件”,无不暴露出药品生产经营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除了说明在药品生产与流通环节存在明显的监管漏洞,尤其是药品经营者无视法律法规、利令智昏之外,其根源与惩处力度不够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药品乃特殊商品,其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更是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然而,频频发生的药品安全事件,足以引起公众对药品安全的广泛关注。

诚然,药品安全包括研发、生产、流通、使用等多个环节,且各个环节缺一不可,稍有不慎，都极有可能出现药害事件，引发安全事故。因此,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药品安全。从立法层面,颁布了《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等法律法规;从监管方面来说,“四个最严”即是一把“利剑”。可见,药品监管有法可依、有“剑”可持,关键是要依法必严、亮剑必狠。

就药品流通领域违法经营而言，其行为不外乎表现在以下方面:挂靠、走票;伪造药品采购来源;虚构药品销售流向;隐瞒真实药品购销存记录;从个人或者无《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购进药品;擅自改变注册地址、经营方式、经营范围销售药品;向药品零售企业、诊所销售药品未做到开具销售发票且随货通行等。

违法问题已经显现,查处号令已经发出,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查实有关情况,从速立案,从快惩处,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不过,监管部门的查处态度已经十分明朗:对于16家违法药企,“待相关情况查实后，将依法严肃处理，直至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不可谓不严厉；而对于10家违反药品GSP经营行为的,则“监督企业切实整改到位”又给了企业“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些,无不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原则。

药品安全兹事体大，各级监管部门要以查处违法药企为“导火线”,多搞些“飞检”,多来些“通告”,加大查处力度,给药品市场来一次彻底整规。具体来说，坚持“严”字当头——严格监管、严格检查、严厉处罚,绝不姑息迁就。同时,建立监管长效机制,如依法纳入“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和“终身禁入”制度等。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28个部门共同达成的《关于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即是一记重拳。唯有严管重查,严厉惩处,方能进一步规范药品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